文学史研究丛书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7-301-06317-2

Ⅰ.中… Ⅱ.陈… Ⅲ.①小说-叙述-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②小说-叙述-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Ⅳ.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470 号

书　　名: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著作责任者:陈平原　著
责 任 编 辑:张凤珠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6317-2/I·0630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12.125 印张　32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1)
自 序…… (1)
第一章 导言…… (1)

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叙事学研究的理论模式——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小说传播方式的转变——作家知识结构的转变——两代人的共同努力——艰难而又令人神往的历史进程

上编 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二章 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 (35)

情节时间与演述时间——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时间——政治小说“一起之突兀”——侦探小说“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言情小说之“前后倒置法”——“五四”小说理论家对叙事时间之冷淡——为了更真切地表现人物情绪——联想并不依自然时序出现——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于人物瞬间的感受中——不同时空场面叠印造成的美学效果

第三章 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 (62)

三种叙事角度——文言小说部分采用限制叙事——章回小说的

全知叙事——“新小说”家从谋篇布局角度切近限制叙事——录见闻的第一人称叙事——自叙体小说的革新意义——作为观察者、记录者的视角人物——“五四”时期的视角理论——第一人称叙事受青睐的原因——日记体、书信体小说风行一时——作为行动者、思考者的视角人物——纯客观叙事——两代作家的区别——真实感的追求——发挥个性与表现自我——间离与反讽

第四章　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 (100)

小说三分法的传入及其影响——“叙事结构”的界定——“写人心”的托尔斯泰不如“讲故事”的哈葛德受欢迎——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位于科学理论的宣讲——山水名胜的描写让位于怪现状的刻画——注重“内面生活”的“新小说”——政治小说中情节功能的削弱——“五四”小说实现结构重心的转移——对西洋小说的“创造性误解”——“五四”小说的独白倾向——“所写正是一时的感觉”——“清新的诗趣”——小说中诗趣的三要素

下编　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

第五章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137)

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产生误解的原因——古典文学而不是古典小说——对“叔侄继承”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诗人、文章家作小说——小说概念的模糊——转化而不只是接受——转化三型——两种移位的合力

第六章　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 (159)

暂把小说当文章读——“笑话小说”——引笑话入小说——“轶闻小说”——引轶闻入小说——长篇小说结构的解体与短篇小说之兴起——“假设问答以著书”——小说中的演讲与辩论——对传统叙

事结构的冲击——游记的视角——旅人成了大时代的见证人——记游式小说统一视角的成效与代价——日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进入作家视野——中国古代日记的著述化倾向——日记与日记体小说——书信之为文体——中国古代书信的著述化倾向——辛亥革命后艳情尺牍的盛行——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特点及作用

第七章 “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208)

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两代作家的不同选择——“补正史之阙”——社会史式小说——“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旅人与限制叙事——小说中之引录诗词——对小说诗趣的寻求——即兴与抒情——“情调”与“意境”——突破情节中心的叙事结构

第八章 结 语…… (237)

“拥有一个更大的针线筐”——叙事模式转变的深层意识——转变只是初步完成——移位过程中的“损耗”——移位过程中的“对话”——四种合力论其二——小说的文人化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文人化、主观化与书面化——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话”——叙事学理论框架之简化——历史的启示

附录一 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 (254)

文学生产工具的变革——报刊、书籍的出版与销行——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每号全回完结”与“每回自成起讫”——短篇小说的兴起——说书规则与小说叙事模式——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从“说—听”到“写—读”——小说的书面化倾向——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附录二　说“诗史”
——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 (285)

被称为“诗史”者——“以韵语纪时事”对抒情诗传统的冲击——史诗与“诗史”——限制中国叙事诗发展的“三座大山”——纪事之切于“史感”——事之近乎“诗”——用典、诗题与联章合咏——在直陈时事与感事抒情之间——讲“诗史”者避开叙事诗——“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对“诗史”的限制与改造

主要参考书目…… (308)
书评摘录…… (311)
索　引…… (328)
新版后记…… (366)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

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 年 2 月 8 日于西三旗

自　　序

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谈到的,我主张“小题大作”。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个中国小说史来说,从1898到1927年这三十年未免太短暂了些;但就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这短暂的三十年值得充分重视。对这三十年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一开始我正是试图这样做);但如果抓住表现特征最为明显而且涉及面较广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也许更能深入论述。当然,选择这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作文章,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行反拨的意图。

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这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隐瞒。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

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彩的例证。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本书的写作一开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可慢慢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以至成了全书的另一个论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论活力的中心。也许,由于理论设计和操作过程失误,我推出的结论会有某些偏差。但我真诚地希望本书提供的大量材料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同时,为便于进一步检验,我尽量减少论证过程中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火花”。

本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写作结果不尽如人愿,只好保留“小说的书面化”一章作为附录,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删去。

关于“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共同制约着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理论构想,是我对中国小说、戏曲、叙事诗的某些主要形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本理解。本指望写完《说“诗史”》等一组文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可惜只完成了第一篇。现附录于此,作为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补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始终得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悉心指导。对此,我十分感激。

参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的吴组缃、乐黛云、孙玉石、吕德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樊骏、王春元等诸位先生,都曾就我的论文修改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另外,季镇淮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为我审阅论文的部分章节;海外学者李欧梵先生曾就论文的基本框架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我的朋友钱理群、黄子平、赵园、孟悦、伍晓明等在我写作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

此书之得以完成,还有赖于我的妻子夏晓虹的鼎力相助。这不只是指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很多精彩的材料,允许我引用她尚未正式出版的专著中的某些观点,以及作为第一个读者,对本书的每章每节提出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1987 年 6 月 25 日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导　言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小说是步伐最稳健、成就最大的艺术形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小说迅速完成了从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嬗变,并为世界文坛贡献了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小说大家以及一大批艺术珍品。考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这自然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可也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首先,什么叫“小说现代化”?其次,这个“进程”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再次,“小说现代化”是个历史概念还是个价值尺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逼着作者在开始正式研究之前,界定所使用的概念、所描述的范围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并披露其大致的理论框架。

“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很多人在使用它,可至今没有人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实际上本书也不准备给它下定义,仍然希望保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与开放性,以免一开局就陷入无休止

的“概念之争”。但这并不等于把它作为廉价的纸帽或桂冠,赠送给每个生活在现代史上的中国作家。

“五四”时期周作人就曾指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①] 理论上谁也不反对小说的现代化应包括小说内容的现代化与小说形式的现代化两个层面,可在实际研究中却碰到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内容层面主要指落实在小说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对这点,研究者似乎还有大致相同的理论尺度;形式层面可就各说各的,没有一定之规,大致以“五四”文学革命后产生的以《呐喊》、《沉沦》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为参照系数。既然没有统一的或相对固定的理论尺度,小说形式的研究自然很难深入,以致造成这么一种本不该有的尴尬局面: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似乎成了中国小说主题思想的现代化。

如今,这种内容、形式两分法,正受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美学的日益强烈的挑战,很难再保持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否定没有形式的“内容”或者没有内容的“形式”,随之而起的是各种熔内容与形式于一炉的新的理论模式。本书不准备详细考辨、评价这些模式,只是想指出:与其再靠分割内容与形式来分头切近“中国小说现代化”这一课题,还不如从类型学、文体学、主题学、叙事学等层面综合把握。本书即试图在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一层面把握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论题转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但研究者的目光仍然盯住中国小说现代化这一诱人的课题。

没有理论模式的形式研究,只能是零星的点评;而一旦建立起理论模式,又不能不时刻防止人为的封闭。因此,本书努力引进历史的因素,把小说形式研究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起来。承认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

①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

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主张小说叙事模式在文学发展中的某种独立性,并不等于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系统,否认其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而是避免把‘社会存在’与‘文学形式’直接对应起来。在具体研究中,不主张以社会变迁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探求文化背景变迁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小说叙事模式中某些变化着的‘意识形态要素’。

文化背景的变迁可能对文学形式的转变起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但到底是哪些文化要素在什么时候对哪些文学形式的哪些要素起作用,却并非一目了然或有通例可寻的。我关注的是发生在晚清到‘五四’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么,对白话诗的兴起或者对小说主题的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就不在本书的视野之内;对明清章回小说或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也同样不在本书的视野之内。既然我关注的是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么跟这种转变有直接关系或只属于它的文化因素自然论述较多;而对那些跟这种转变、也跟其他许多转变都有关系的文化因素则只能从略。也就是说,本书对诸种文化因素论述的多少,以其对小说叙事模式影响的程度而不是其自身价值的高下为依据;而所有这些论述又都力图围绕小说叙事模式来展开。一句话,尽管引进了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本书论述的中心仍然是小说叙事模式。

叙事学研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列出五种叙述分析的重要门类:次序、延续、频率、心境与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在《叙事作为话语》中则把话语手段分为三部分: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叙事语式。在为本书设计

理论框架时,我受到这两位小说理论家的启发;但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不能不更多考虑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不是理论自身的抽象性与完整性。我认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应该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其中"叙事时间"参考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而不取热奈特和托多罗夫对"情节时间"与"演述时间"的更为精致的分析;"叙事角度"约略等于托多罗夫的"叙事语态"与热奈特的"焦点调节";"叙事结构"则是我根据中国小说发展路向而设计的,着眼于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在情节、性格、背景三要素中选择何者为结构中心?这似乎是个不被当代小说理论家青睐的理论性不强的课题,可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却至关重要。

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尽管有个别采用倒装叙述的(如唐代李复言《续幽怪录》中的《薛伟》、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中的《女侠》),有个别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如唐代王度的《古镜记》、清代王　的《看花述异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如唐初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也有个别以性格或背景为结构中心的(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和《山市》);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20 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

二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到底起于何时终于何处,这无疑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相对来说,起点还好说些。既然我们承认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在西洋小说的刺激诱导下完成的,那么自然可以以中国人开始自觉地翻译、学习、借鉴外国小说为起点。终点可就不大好界定了。我们既不能把这种转变描绘成无边无际的朦胧一片的"进军",又不可能把某一年某一天断为转变的彻底结束或完成。既然把"小说现代化"设想为一种"进程",那就必须承认它是开放的,在运动中不断自我完善,根本不可能把它封闭起来;可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又不能不给定一个转变的时间下限。折衷的办法是寻找一个基本完成转变的"点",作为研究者假设的暂时的"终点线"。

什么叫"基本完成"?百分之几?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缺点是不确定性(可也是最大优点,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研究者的想像力与思考力)——无法在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一切只能靠研究者自己感悟和理解。在大部分人文科学研究中,这可能是值得庆幸的"永远的遗憾";可在特定范围内适当引进定量分析方法,则无疑可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根据小说叙事模式三个层次的不同变项,我抽样分析了 20 世纪初期(准确地说是 1902—1927 年)的中国小说(著、译)797 部(篇),描述出这一转变的大致运动轨迹,并确定 1898 至 1927 年为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时间。

1898 年以前,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小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刊于 1872 年 4 月 15 日至 18 日《申报》的《谈瀛小录》(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第一部分)、刊于 1872 年 4 月 22 日《申报》的《一睡七十年》(即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连载于 1873 至 1875 年《瀛寰琐记》三至二十八期的英国小说《昕夕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